

20 世纪军事秘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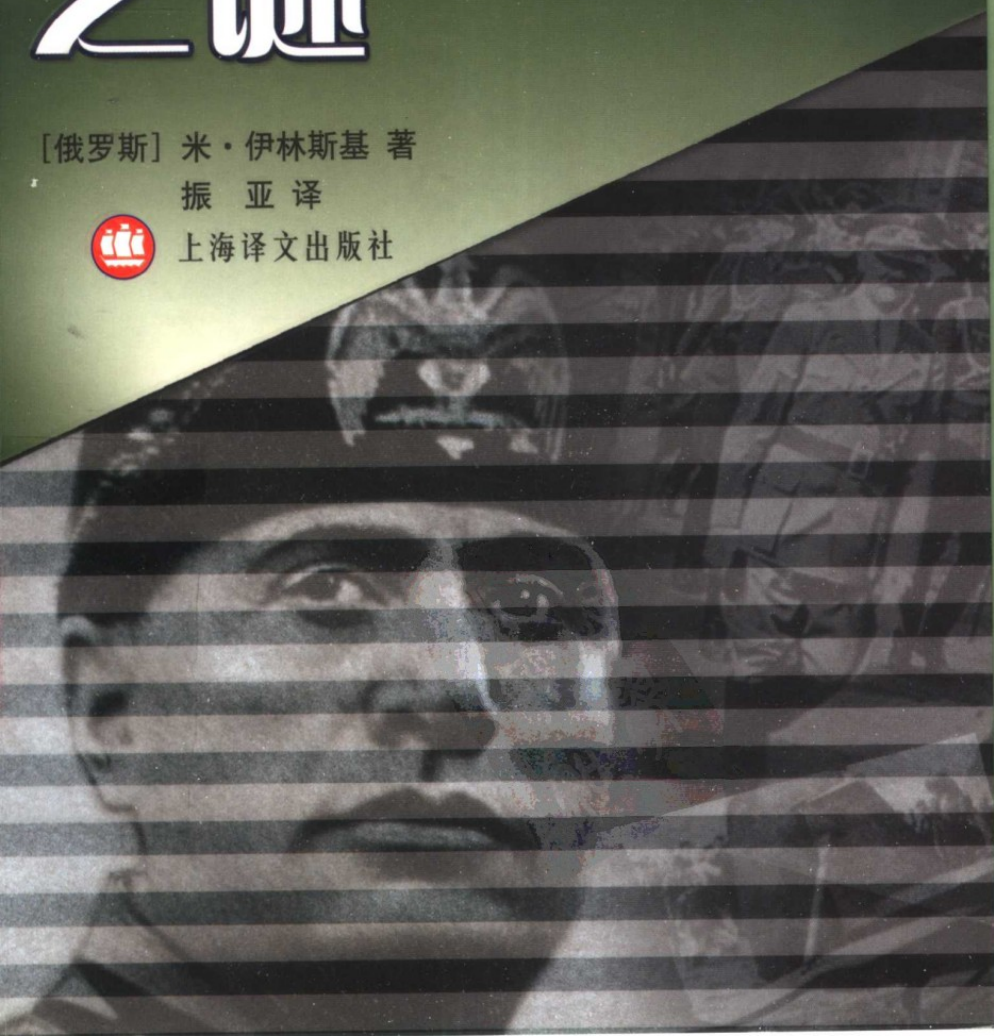
墨索里尼 之谜

ВОЕННЫЕ
ТАЙНЫ
XX
ВЕКА

[俄罗斯] 米·伊林斯基 著
振 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 世纪军事秘密丛书

墨索里尼 之谜

ВОЕННЫЕ
ТАЙНЫ
XX
ВЕКА

〔俄罗斯〕米·伊林斯基 著
振 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蘇平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索里尼之谜/(俄罗斯)伊林斯基著;振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

(20世纪军事秘密丛书)

ISBN 7-5327-2997-4

I. 墨... II. ①伊...②振... III. 墨索里尼, B.
(1883~1945)一生平事迹 IV. K835.4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683 号

М. Ильинский

Жизнь и смерть Бенито Муссолини

本书根据俄罗斯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ВЕЧЕ》,

Москва, 2000 年版译出

简体字中文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帮助获得

图字: 09-2001-267 号

墨索里尼之谜

〔俄罗斯〕米·伊林斯基 著

振 亚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71,000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997-4/K·105

定价: 22.00 元

作 者 序

这本书我写了好多年。对我们这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这个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切，至少总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这出于种种心情。“法西斯分子”这个词被视为一种侮辱，但是我觉得，数十年来欧洲、美洲和其他大陆的居民未必想搞清楚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么区别在哪里？是什么东西使它们联合起来？又是什么东西使它们分道扬镳？它们留下的遗产究竟体现在哪里？为什么它们留下的一处处露出水面或潜藏水下的“礁石”还在当代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甚至东欧国家社会轮船的船底捅出一个个漏洞？这在许多人看来显得有些奇怪，因为恰恰是东欧国家遭受那场黑色—棕色瘟疫的灾难特别严重。现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前面往往再加上一个“新”字，那么这个“新”字又包含着什么内容呢？

许多东西已经被历史遗忘了，但是对于这个现象历史却不可能视而不见，阐述这个现象的书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作者们的立场也各不相同，有的从意识形态角度，有的从社



会经济角度,他们的观点也往往互相对立,有褒有贬,而且经常陷入极端,因而容易失去分寸感、客观性和现实性。这是可以理解 and 解释的。

“20 世纪的独裁者”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永远是个热门的话题。他们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都起过作用,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留下了痕迹,而且我深信,在数千年的编年史上他们的痕迹不会消失,不仅 20 世纪的几代人,而且以后几个世纪的人们还将作出自己的评价。

我研究的中心,这本书叙述的主体和客体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他的时代、他身边的亲信、与墨索里尼同时消亡以及在他死后甚至在我们之后还会长久保留的那些东西。

墨索里尼是个非常复杂而多面性的人物。我们习惯于看到他是个狂妄、傲慢、自鸣得意的家伙。他的许多照片、数千公尺电影胶卷、油画、图片、铜像、石膏像、石刻浮雕和大理石雕像都保留下来了。罗马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这样的文字:“领袖墨索里尼”;米兰、那不勒斯、都灵的好多街道是按照墨索里尼的理念建造的,形成了特殊的建筑风格;在佛罗伦萨、罗马、巴勒莫、巴里和博洛尼亚留有墨索里尼居住过的房子;这个法西斯头目、意大利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奠基人发表过演说的“斯卡拉”剧院、“圣卡洛”剧院和“菲尼契”剧院依旧存在。

“奠基人”这个词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个褒义词,具有开拓意义,表示光辉的前途。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的奠基人就是这样。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过要寻找并确定法西斯主义的奠基人。可以用任何一个贬义词去跟法西斯主义搭配,但绝不能用“奠基人”这个词。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贝尼托·墨索里尼就是这样一个人。

也许墨索里尼直到 60 岁才领悟了莎士比亚的至理名言:人

必须耐心地等待自然而然地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他自然而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一样。这还算不上高明,而只是表示成熟罢了。

墨索里尼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见。领袖巴不得剥夺别人发表意见的权利,他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周围的人。不过根据他的妻子拉凯莱和长女埃达的说法,有一点他说对了:表达的观点必须有理有据,否则就应该憋在心里。尽管人人有评判并用书面或口头(通过广播或在大庭广众面前)的方式加以表达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可能是危险的。其危险程度可能超过人们的想象。而在其他方面,墨索里尼喜欢像西塞罗那样反复强调:“我能够记住所有的事情,甚至记住不想记住的东西,我想忘掉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掉的东西。”墨索里尼善于记忆、演说、说服别人、吸引别人……

在相对短暂的历史阶段(大约 40 年),民主革命时代的意大利,即复兴运动——为全国统一而斗争——时代的意大利,变成了压迫其他民族、掠夺邻国土耳其和奥地利、侵占非洲领土、吞并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变成了反动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意大利。这是马列主义者的观点,在很多方面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意大利的一些大历史学家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如沃尔佩于 1940 年在米兰出版的《1914—1915 年和平与战争中间的意大利人民》一书),似乎法西斯体制是复兴运动的直接继承者。这个体制克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20 年代可能导致严重危机的种种困难,换了法西斯和墨索里尼上台之前的那个脆弱的自由派政权,绝对不可能克服这些困难。

另外一种理论听起来也很有说服力,这种理论的主要论题是:促使意大利法西斯上台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缺乏铁腕人物、经济基础薄弱、笼罩亚平宁的折中主义情绪、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现象以及匪盗横行。环境本身要求恢复秩序和纪



律,稳定和发展企业,恢复和发展经济,开拓新的市场。以我看来,还有一种公正的观点。这种观点吸收了上述几种理论和观点的“合理内核”,认为意大利法西斯上台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家政变。这场政变就像一枚威力巨大、准时引爆的炸弹。法西斯阴谋家在他们选择的从 1915 年 5 月到 1922 年 10 月这一段时间内彻底摧毁了脆弱的自由派和假民主派体制。于是在阳光明媚的亚平宁半岛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耸立起了一座钢筋水泥的、密布刺刀和大炮的法西斯大厦,从此法西斯像宪兵那样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其势力开始向四面八方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大肆渗透和扩张。

我完全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在长达 20 年的法西斯独裁时期,在意大利本土不可能写出真实的法西斯史、墨索里尼传记和意大利史,因为意大利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尤其是表达思想的自由——言论自由。自由消融在“法西斯的相对性空间”中,只有那些跟在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头目后面亦步亦趋的人才有自由。客观地撰写意大利 20 年(1922—1945)历史又从何谈起呢?

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性格形成、政治信念的确立和精神气质是受了谁的影响呢?对这个问题他往往喜欢自己回答:“我 20 岁的时候钦佩尼采,正是他巩固了我天性中的反民主因素。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同样对我的政治生涯大有裨益。他让我明白,人的这种或那种行为必须根据其结果进行评价,而不是根据空头理论。我从詹姆士那儿学到了对行动的信仰,对生命和斗争的火一般渴望,法西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信仰和渴望……。但是我首先要感谢的是乔治·索雷尔;这位工团主义的祖师爷以其严酷的革命策略理论促使我用最坚决的手段制订法西斯队伍的纪律,保持充沛的精力和能量。”

这是什么?卖弄,自我欣赏,心血来潮,还是演说才华的进



发？都不是。但是又都有点儿。也许这是早年墨索里尼政治思维的综合体现。墨索里尼成熟后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们姑且也把这种看法作为“基础”。

墨索里尼喜欢反复强调：“我听从我血液的召唤。当我信赖我的潜意识或感觉的时候，我从来不犯错误。”墨索里尼犯的错误确实不多。但他犯的都是致命错误，因此他跟着潜意识走的时候也就渐渐走向了悲剧式的终点。这是墨索里尼作为一个人、一名政治家和法西斯魁首的命运轨迹。

一个民族和一个人命运中的许多事情是由我们地球上的战争决定的。20 世纪的历史也不例外，恰恰相反，它再一次证实了这个真理。对发动战争的那些人来说，选择时机永远是重要的，而对许多参与战争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跟谁走和往哪儿走。在这方面意大利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子。政治赌博开始的时候它站在一方，结束的时候它总是站在原来敌对的一方，而且永远在胜利者之列。只赢不输，这样的事情太合算了。从古罗马时代起意大利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意大利学者、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路易斯·博南特写过一本名叫《战争》的书，其中讲了从 1648 年到 1989 年世界上发生的所有战争。总共发生了 177 次战争，其中 67 次发生在 1816 年之后。1917 年和 1943 年交战双方遭受的损失最大。按百分比计算，意大利始终是战胜国，损失最小。

法国被该书作者称为最好战的国家，参加了 22 次战争。英国和俄罗斯参加了 19 次。百分之七十的战胜国是那些发起战争的国家，如果发起国成了战败国，那么失败是全方位的，无妥协可言。“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作者写道，“这是力量的高度集中，资源的总动员，财富的大敛聚。”“在现阶段，”博南特继续道，“大国之间，甚至原先不共戴天的仇敌之间的战争已经变得不可

能了,但是区域性战争的数量却在增长。”(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还没有瓦解,离车臣战争、南斯拉夫战争、北约国家对贝尔格莱德发动侵略战争也还很遥远。德国参与北约国家攻打南斯拉夫是 1945 年之后它首次参与军事行动,而意大利成了对塞尔维亚实行空中打击的主要桥头堡。)那么战争是否让人们学会了许多东西呢?

1915 年 5 月,欧洲的战火已经燃烧了 10 个月,外交人员早已撤离了敌对国家的首都和领土,这时候意大利撕毁 1882 年与德国和奥地利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而转向协约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一直在静观待变,它期待着由别人的手来摧毁竞争者奥地利的势力,使它一蹶不振,而让勇敢的意大利士兵等着去参加那些不太危险的军事行动。这样的说法可能显得有点儿简单化,但不是没有理由的。尤其是那些深谙意大利民族性格的人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意大利人始终是正确的,永远站在强者一边,也就是说他们指望取得胜利,尽管往往头脑发热而贸然冒进。那又怎样呢?……不管怎么说,意大利终于参战了,从中立转向积极干预政策——战争和掠夺领土、经济资源以及战利品的思想占了上风。这就是未来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体制的基石。

1999 年 7 月《晚邮报》报道了法西斯历史学家菲里契所著《法西斯: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的阐述》两卷本再版的消息。这对当代人反思 20 世纪初期那段历史是个不小的事件。该书作者终于揭开了长期隐瞒的“客观真相”:支持意大利法西斯的不仅有以前大家口诛笔伐的大地主、企业家、金融家和国王,还有全国的大多数居民。1914—1922 年间在意大利毫无疑问有坚守自己立场的人。但是社会主义者从冲锋陷阵的先锋变成了落在队伍后面的散兵游勇,他们的领导人放弃了阵地,差点没追随墨

索里尼。这时候社会主义者试图给墨索里尼扣上社会主义运动叛徒的帽子。他们这样做未必有道理。首先，墨索里尼已经被开除出党，这些高尚的先生没有必要向他背后扔石块。其次，墨索里尼只是在打自己的牌，在仔细权衡每一个政治步骤和每一句“播撒到群众中”的话。赌注下得很大，因此说他叛卖无非是虚弱的表现，是预先断定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和议会主义者必将遭到大败。墨索里尼没有什么人可以出卖，而出卖自己暂时还没有学会。

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政治演变似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步是转向积极干涉政策并与意大利社会党一刀两断；第二步是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墨索里尼的民族主义立场得到巩固，他的政治影响大为增强；第三步是法西斯宣称自己是能够制服意大利的自由派、建立权威的政权的政治势力。这一切都合乎规律、合乎逻辑。

如果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议会中的议员不是威信扫地，那么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变就不可能发生或者不能成功。对墨索里尼一生中的这个阶段，人们往往加以假设，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理论上进行推测。历史学家对此很少研究，即使谈论的话也带有偏见。有的公然为法西斯辩护，为先知先觉的领袖大唱赞歌，对他的高瞻远瞩和旷世天才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20世纪上半叶所有极权体制的共同风格和必不可少的装饰）。另外一些人把墨索里尼批得“体无完肤”，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个时期。领袖已经死了，不可能为自己辩护了。没有一个人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辩护和粉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受到各国人民的一致谴责，而在法律上受到了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审判。

人类历史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进行了审判。墨索里尼



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奠基人被历史的磨盘碾得粉碎是罪有应得。有人说贝尼托·墨索里尼不会犯错误,但一旦犯错误就彻底完蛋。

20 世纪和 21 世纪更迭之际,出现了一个历史“解冻”时期,人们对重新看待和重新评价独裁者的历史作用产生了兴趣。

如何看待墨索里尼在 1933—1939 年间所起的作用,对这个问题出现了极其“大胆的”“修正”。有些历史学家(主要是英国历史学家,而不是意大利的历史学家)说,与希特勒这只凶恶的“鹰”相比,领袖是爱好和平的“鸽子”,而远征非洲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游戏”,“顽童的调皮捣蛋”……。远征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只不过是为了跟柏林步调一致而犯下的一个错误。

马格列霍尔·克罗克斯和泰尼斯·马克斯米特两位历史学家试图把 30 年代的事件,罗马和柏林的勾结说成是被迫无奈,似乎墨索里尼没有别的办法,而他个人对希特勒施加了正面的影响,曾劝阻柏林放弃领土要求,如果说他自己也掠夺过别国的领土,那么这只是为了不当“白乌鸦”,另外是要让“意大利民族尝尝远征国外的乐趣”。

但事实并非如此,37 岁的英籍意大利历史学家罗伯特·马列特表示反对。他写道:“墨索里尼的面貌从来不是爱好和平的。相反,他一贯主张采取经过精心的秘密策划、像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主动而激烈、突然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至于哪些地方是墨索里尼感兴趣的作战区域,他曾亲自画了一张地图,上面标着地中海的英法基地哪些该中立哪些该消灭。这就是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马耳他、土伦、比赛大……亚丁被看做是扩张和控制红海的桥头堡;曼德海峡则是“通往印度洋的大门”。签订慕尼黑协定前夕,意大利海军参谋长多米尼戈·克瓦尼亚里上将给自己的亲信下达秘密命令:“准

备行动。一切都已经由柏林和罗马的最高层作出了决定。”占领埃塞俄比亚只是赢了个小卒子,但预示着全盘的胜利。海军部订购了新的舰艇,这些舰艇必须在1943年前交付使用。有人据此作出仓促的结论:“大战”开始的日期不会早于1943年夏天。但是时间飞驰的速度更快,而且遵循自己的规律……意大利无法驾驭这些规律。

1938年夏天,德国和奥地利刚合并,海军部就四处发出订单并要求尽快交货。很明显,加强军备的速度开始加快了。为什么?如果要发动战争,那么跟谁作战?什么时候开战?据马列特的看法,1937年1月和1938年4月签订的意大利—不列颠条约并没有使罗马和伦敦的矛盾趋于缓和。墨索里尼制订的那些旨在向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地区扩张的计划得到了柏林的同意。

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罗克特于1999年在意大利出版了《埃乌米斯维尔》一书,作者断言第三帝国和墨索里尼政权不仅有共同的毛病。它们不仅仅是两个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国家,那里的文化、医学都得到了发展。譬如,柏林首先与癌症开战,试图在公共场合,甚至在飞行员宿舍禁止吸烟。墨索里尼假装倾听“柏林的声音”;不过他也一度戒了烟。

希姆莱被认为是希特勒德国最著名的“环保主义者”。这个党卫军头目的妻子是卫生工作者玛格丽特·波登,她教丈夫喝草汁,服顺势疗法的药,在干草堆里洗澡(只用燕麦秸)。她居然说服了希姆莱帮助希特勒戒烟,在达豪集中营建立“绿色的天堂之角”。他们的朋友法连坎普医生在这个集中营不仅用焚尸炉杀害犹太人,而且在旁边种药草养蜜蜂,采到的蜂蜜就分送给国外的朋友。特别要指出的是,希姆莱的蜂蜜通过党卫军系统送到了罗马。正如在意大利被判处终生监禁的党卫军上尉埃里



希·普里布克所说的那样,驻扎在罗马的几位德国年轻军官戒了烟,宣称自己是“素食主义者”,还打算像元首那样“养蜜蜂、喝草汁”。

墨索里尼也想给人留下“环保主义者”的印象。意大利的最初几个自然保护区就是在墨索里尼时代建立的,他还希望在国内建立起欧洲屈指可数的皮毛工业。

墨索里尼亲自送给爱娃·布劳恩两件用水貂皮和狐狸皮做的大衣,对方向他表示感谢并且请他再寄一件水貂皮短大衣。她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大衣做得又快又好,富有意大利式的华贵和韵味。

爱娃的许多照片上都穿着短大衣。就是那件用 45 张水貂皮在佛罗伦萨附近的皮斯托亚市制作的短大衣。皮斯托亚市的毛皮师傅早在 15—16 世纪就替美第契家族中最讲究穿着的老爷太太们以及他们的亲信做衣服了。(30 年代意大利大约养 2 万只水貂,3 万只狐狸,5 千只海狸。现在意大利的农场养 4 万只水貂,4 万只狐狸,5 千只海狸。做一件皮大衣要用 34—54 张水貂皮、10—24 张狐狸皮、16—20 张海狸皮和其他材料。)

……1945 年 4 月 1 日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个复活节。在我们国家“4 月 1 日这天谁的话也别相信”,而在意大利、法国和欧洲的其他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那时候人们对“愚人节”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战争的最后几个音符绝无玩笑的性质。意大利北部——米兰、博洛尼亚、曼杜亚、都灵——还在德军控制之下。粮食匮乏,许多城市没有电、煤气,自来水供应时断时续。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另一方面是豪言壮语满天飞,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天天作出判决,宣布对参与犯罪和武装匪徒偷袭的游击队员处以死刑。但判决越严厉,反抗也越坚决越顽强。城乡的街道和广场上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墨索里尼的政权已

经千疮百孔,濒临灭顶之灾,事情明摆着,无论怎样的大坝和支撑都无法遏制一场日益严重的“大水灾”。

1945年的“棕榈礼拜日”与别的棕榈礼拜日的区别在于:人们挤满了教堂,手里拿着橄榄枝,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只包含一个意思,只有一个包罗万象的愿望——尽快实现和平。而在意大利恢复、实现和巩固和平只有一个途径——解除墨索里尼和其他几名法西斯头目的职务。战争及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所有折中调和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舒斯特大主教跪在米兰大教堂的祭坛前祈祷:“主啊,我们只祈求和平。饶恕我们所做的一切吧……”舒斯特大主教跟墨索里尼的交情非同一般。

……这一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孩子们在米兰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追逐一群群鸽子,给它们吃东西,跟父母一起照相。(真奇怪,一切都跟千年之交的现在一模一样!)这时战争已近结束。不过话要说回来,早在1944年6月21日,原驻巴黎记者、都灵《新闻报》代理主编孔切托·佩蒂纳托就已经预言这场血腥的大屠杀即将结束,意大利将退出战争。他撰写的社论直截了当地说:“请你们擦亮眼睛看看,我们的领袖已经输得精光了,就像那位穿新衣的皇帝。错误再也无法原谅了。”首先对这篇“挑衅性”文章作出反应的是萨洛政府,它成立的一个纪律委员会解除了佩蒂纳托的职务。最后对这种攻击作出回答的是墨索里尼。

1944年12月16日。脸色苍白、瘦了许多的领袖出现在米兰剧院的时候,他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吃了败仗、丧失了意志和毅力的人。墨索里尼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我们必须咬紧牙关死守帕丹平原,不放弃一寸土地……”不过这只是一句空话罢了,是“无可奈何的哀鸣”。就连死心塌地的法西斯分子、希特勒



和墨索里尼的追随者、鼓吹“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孔切托·佩蒂纳托也说了一句大实话：“领袖已经输得精光。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1945 年春天，党卫军上校、间谍、唯美主义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谈时担任翻译的多尔曼也公开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到意大利来是想看一看‘不穿衣服的国王’，结果只碰到了墨索里尼……”

我将描写 1934—1945 年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 13 次会见，这将有助于研究这两个暴君的观点和外表是怎样一步步演变的。

……罗马。永恒之城之所以永恒，是因为 2700 多年来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岁月过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但城里的一切却世代相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没有人去侵犯、破坏过去的东西，尽管一座宫殿、一个教堂或一幢房子往往建立在原来的宫殿、教堂或房子的基础之上。现在的罗马底下埋藏着中世纪早期的罗马，再下面又是古罗马的遗迹……。只有墨索里尼逆时代潮流而动。根据他的命令一批建筑师开始修正已往的建筑遗产。墨索里尼不怕毁坏永恒的旧基石。他有没有权利这样做？谁有破坏的权利？

根据这些“无所不能的建筑师”的意见，凡是没有“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没有实用价值、影响交通的东西，都应该拆除。墨索里尼同意他们的观点。于是“永恒”的基础纷纷遭到破坏。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而墨索里尼大笔一挥，立即批准。不过这是一个特别的话题。

许多事情墨索里尼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的，每个阶段他只珍惜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譬如，1921 年他断言需要改变的不是人，而是国家的自由主义体制，他给意大利国家体制的本

质下了这样的定义：“国家现在变得像大象那样特别臃肿笨拙，包罗万象，因而特别脆弱。它承担起了过多的本来应该属于私人经济自由游戏的功能。（这跟 70—75 年后东欧某些政治家的言论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国家现在扮演的角色是买卖香烟和咖啡的小贩、邮递员、铁路员工、保险代理人、轮船船长、银行家、澡堂老板等等。我们主张让国家恢复它应有的那些功能，即政治—法律功能……加强国家的政治与国家经济的全面转向这两者互相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

墨索里尼这位无可争议的雄辩家和慷慨激昂的演说家在准备夺取政权，利用企业家、大地主、中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即大多数意大利公民的情绪的时候就已经在毁灭意大利国家的基础，已经开始展示在不久的将来他要建立的那种社会结构。“自由主义国家，”墨索里尼在 1922 年 10 月 4 日的演说中愤怒地揭露说，“那是一副假面具，可是遮盖不住任何人。那模样像脚手架，可是盖不了房子……”还有，“自由主义”这几个字本身包含了什么内容呢？是动摇不定，迟疑不决，缺乏稳定。“那些与这样的国家一起前进的人也感到它已经走到了尽头。走到了耻辱甚至啼笑皆非的地步。”在一番“意识形态”改造之后，墨索里尼开始动用自己的法西斯部队，或者期待对手向他无条件缴械投降，或者自动离开。那时候常常有人自杀。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哪儿没有自杀现象呢？（请回想一下莫斯科在各个不同的年代，包括 1991 年 8 月，有多少人自杀。）

墨索里尼办事干脆利索，较少使用外交手腕。他有时候甚至喜欢展示自己“残忍的一面”。“我越来越坚信，为了意大利的利益可以枪毙一打国会议员，也可以让几名下台部长去服役役（流放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也没有关系）。我越来越坚信，意大利议会毒害民族血液的瘟疫溃疡。当务之急是一定要割除这



溃疡。”

七八年后他找到了一种不用手术刀就能割除这处“溃疡”的办法，那是他从童年时代就熟练掌握、随时可以作为“切割工具”加以使用的一把农民用的普通镰刀。

墨索里尼是向公众发表演说的高手。他具有领导大规模骚乱的特殊嗅觉、政治家的直觉和意志以及出众的组织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他是一个恬不知耻的实用主义者，是一名“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和“动作演员”，是个时刻受虚荣心、铁石心肠和精神极度亢奋驱使的人。这一切又跟披着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外衣的民族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而这些观点又因为他高超的演说技巧、罕见的天赋和充沛的精力而广为传播。

墨索里尼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想领会其中的精神。如果一时无法领会，或者除了矫情和声带的震动外他的演说空洞无物，那么“法西斯”信徒们还是会继续努力寻找，确切地说是按照自己的领会去补充领袖的话。譬如他说“是”，大家全都跟着说“是，这很重要……肯定是这样……”

……我怎么会想起要写这本关于墨索里尼、关于他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平常的书呢？

大约在 15 年前，在意大利北部的科莫举行了一次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市长会议。那时候我的意大利朋友告诉我，一个名叫米科勒·莫列蒂、住在科莫湖畔一座老房子里的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参加过加里波第游击队，平时沉默寡言，命运奇特，是个神秘人物。他隐姓埋名侨居瑞士将近 40 年。

“为什么他要离开民主自由的意大利到同样民主的瑞士，在那儿隐姓埋名？”我感到疑惑不解。

“他必须这样。”对方回答说。“米科勒是个神秘人物。是他在 1945 年 4 月杀死了墨索里尼。”